

六朝史論集

孫家正題



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编

黄山书社出版

六朝史论集

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编

黄山书社出版

皖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宋效永

封面题字：孙家正

六朝史论集

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编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283 号)

南京政治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220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 册

ISBN7—80535—624—6/K·337

定价：6.90 元

序

卞 孝 萱

南京是六朝的都城，江苏是六朝的重要地区。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于1985年11月在南京成立。几年来，我会在促进六朝史的研究和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方面，作了努力。即将付印的《六朝史论集》，是我会会员最新研究成果的一次结集。面对案头的稿件，欣慰之情，不能自己，在这本书的开头，写几句话。

江苏省委副书记孙家正同志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书名。厦门大学教授韩国磐先生远道寄来《略言六朝之盛》的题词。四川大学教授缪钺老先生以九十高龄亲撰论文：《人生可贵是真情——读陶渊明〈归去来辞〉札记》。道义上的支持，学术上的指导，使本书增添光彩，使我会增加光荣，使全体会员得到启发和鼓舞。感激之心，非拙笔所能形容。

本书选录了会员的30余篇近作。从作者说，包括老、中、青；从题目说，涉及六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这里向读者介绍几篇青年学者的论文。

胡阿祥同志《南朝宋齐时期的左郡左县、徕郡僚郡》一文提出：左郡左县存在于宋、齐，徕郡僚郡的建立则晚至齐，都是为了集中治理降附的蛮、徕、僚所置。其特点为，保持旧有的统治方式，在赋税方面有所优待，行政规模一般较小，分布范围甚广，等等。这种特殊地区，上承秦、汉道制，下启唐、宋的羁縻州县制。

李天石同志《试论侯景反梁队伍的扩大与梁朝奴婢》一文提出：梁朝奴婢在帮助侯景推翻萧衍统治、打击士族地主方面，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既无政治经验，又无领导能力，破坏了社会经济，加快了侯景政权的覆亡。

张学锋同志《菰菜、莼羹、鲈鱼脍与吴人的乡思》一文提出：三道名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晋平吴后的吴人心态。张翰出于对西晋政权的失望，对久不见知的忿恚，和对三江吴地的眷恋，借此三味弃官南归。

傅江同志《“服妖”的一点思考》一文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新潮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变化快，式样不断翻新；二是流传广，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服饰上的交流频繁；三是追求新、奇、怪，敢于显示个性与创造力，从而开创了我国服饰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时代。

孙永如同志《南朝寒门文士的社会境遇与宫体诗》一文提出：寒门文士不具备士族文士的政治凭仗和经济基础，入仕以后，小心谨慎，诗歌创作尽量避免触及时事，他们的境遇，又剔开了田园山水这片自然界的取材园地，可供描述的对象便只有艳情秀女了。

青年是我们事业的希望所在，眼见我会一批青年会员茁壮成长，眼见他们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使我感到欢欣和慰藉，衷心祝愿我会青年学者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总之，《六朝史论集》中的作品，有的角度新颖，有的填补空白，有的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结合，把六朝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今后，我会每隔一段时间，编选一册《论集》，将会员的研究新成果，向学术界汇报和求教。

目 录

- 序 卞孝萱 (1)
- 略言六朝之盛 韩国磐 (1)
- 人生可贵是真情
- 读陶渊明《归去来辞》札记 缪 钺 (2)
- 六朝门阀士族的历史地位 孟昭庚 (8)
- 试论东晋中期门阀政治的演化
- 围绕桓温专权的研究 王永平 (18)
- 论南北士族的协调与东晋王朝的建立 方亚光 (27)
- 六朝疆域变迁述论 许 辉 (39)
- 南朝宋齐时期的左郡左县、偃郡僚郡 胡阿祥 (47)
- 试论侯景反梁队伍的扩大与梁朝奴婢 李天石 (58)
- 徐州与六朝 叶聚森 王云度 (68)
- 菰菜、莼羹、鲈鱼脍与吴人的乡思 张学锋 (78)
- 六朝时期蚕桑丝绸棉布生产与
- 人民生活的关系 张承宗 孙 立 (86)
- 东晋南朝江南农田水利的发展 汪家伦 (94)
- 泰始年间青齐豪民的南徙与郁洲岛
- 红花的种植 滕昭宗 (106)
- 六朝时期的方山埭与破岗渚 王 引 (115)
- 东晋南朝对海外的经济交流 牛少贤 (119)
- 略论六朝的江防 何荣昌 (126)
- 略论三国时东吴和蜀汉的和与战
- 章振华 杨学善 (136)

陶侃与平定苏峻之乱	刘 明 (144)
论晋灭南燕之战	刘 宇 (150)
吴明彻北伐及其失败原因	戈春源 (159)
六朝格义佛教得失论	孙述圻 (165)
“服妖”的一点思考	
——从“服妖”看魏晋南北朝的	
服饰新尚	傅 江 (174)
东晋南朝目录学的发展	邱 敏 (182)
试论支遁对东晋佛教的贡献	王 波 (193)
茅山南朝梁题刻与《瘞鹤铭》	陈世华 (202)
南朝寒门文士的社会境遇与宫体诗	孙永如 (210)
试析梁武帝佛教治国	刘曼春 陈俊峰 (217)
六朝文物所示我国早期佛教的发展	李蔚然 (225)
六朝文物所见六朝政治面貌	罗宗真 (232)
六朝艺术瑰宝	
——丹阳南朝陵墓及石刻	杨再年 (243)
齐梁故里南兰陵考	贺忠贤 (251)
南朝砖画探析	徐伯元 (258)
六朝古刹惠山寺始建考	朱锡勋 (267)
附录：南京秦淮风光带简介	(273)
后记	(276)

略言六朝之盛

韩国磐

或曰六朝金粉，或言六代豪华，爰自孙吴东晋，历经宋齐梁陈，虽云雄据江左，亦惟半壁河山。新亭饮泣，徒怀悲于往哲；关内覆师，由夺位而南归；历数屡更，犹经三百余载；新朝频建，共历四十人君。苟无英杰储峙，安能偏方割据？故沈约书之于史曰：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庾信亦著之于赋云：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桔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颺浮玉，南琛没羽。盖当萧衍称帝之后，梁朝全盛之时，良畴美柘，畦畝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无奈侯景之乱，遂生尧城之变，繁华消歇，人物凋零，盛衰更迭，载籍斯在。论武略则周瑜扬威于赤壁，陆逊制敌于夷陵，旋师称量沙之谋，御敌有长城之将。述文事则二陆为吴郡之英，陶谢乃晋宋之杰，沈范则领袖风骚，徐庾则专擅文彩。四声八病，始发明于江左；文选文心，均载誉于千年。至于书尊逸少，画赞虎头，咸称绝作，雄踞艺苑。若乃天文地理，历法术数，皆有创造，超迈前人。勾股有方，割圆有术，钢经百炼，船名千里，超越江海，窥测日月，精思巧艺，层出不穷。由是而言，六朝固为纷扰多事之秋，亦饶繁盛发明之迹。面首狎客，未可全斥以荒淫；鹄飞鹏举，还宜深探其经略；去其糟粕，而钻研典册之闾奥；取其精华，以光大炎黄之文明。

人生可贵是真情

——读陶渊明《归去来辞》札记

缪 钺

在人的一生中，真情应是最可贵的。一个有识之士，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理想、事业、至亲好友，甚至一草一木，都具有真情。在文学作品中，亦以具有真情者为上乘，游词假象，虽有辞采，不足取也。昔人谓，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下泪者必非忠臣，读李密《陈情表》而不下泪者必非孝子。因为这两篇文章都是真情洋溢，故很能感人。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四部丛刊影宋本）欧阳修所以对《归去来辞》评价如此之高，首先因为它完全是真情洋溢之作，毫无游词假象。所以李格非也说：“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同上）所谓“如肺腑中流出”者，也就是真情自然流露之意。

《归去来辞》并序，虽然是千年传诵、家喻户晓之作，但是仍有细加分析之必要。

陶渊明少有用世之志。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臣，对晋室有扶微定倾之功，所以陶渊明也很想有所建树，继承先业。同时，陶渊明家贫，也想藉官俸以维持生计。不过，陶氏在当时已经式微，与王谢高门不同，所以他只能出任小官，在数次出仕中，还是途径坎坷的。他二十九岁时，（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宋书》本传）当时江州

刺史是王凝之，王是天师道世家，又信佛教，与陶渊明是合不来的（陶的宗教信仰淡薄），所以陶就自动辞职了。解职后，开始“躬耕自资”。此后，陶渊明又三次出山，任军府幕僚。一次是在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任桓玄僚佐，次年冬，因母孟氏卒而去职。另一次是在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裕起兵诛灭篡位的桓玄，为镇军将军。陶出任镇军参军。次年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又为江州刺史刘敬宣建威参军。陶渊明这几次出任军府幕职，主要是为贫而仕，说不上用世之志。即便是为贫而仕，陶的心中充满矛盾与痛苦，他厌恶官场，很想归隐，他在这时所作的因公行役的诗中说：“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又说：“高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可见他是时常想弃官归隐的。

陶渊明辞去军幕归来，家居生计仍然难以维持，于是在义熙元年又出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又弃职归田。此中曲折情况，陶在所作《归去来辞·序》中说得很清楚，兹录其全文如下：

余家贫，耕织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可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从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在仕隐进退上矛盾复杂的心情以及其后弃官归隐的毅然决断。仔细分析，这篇

序文含有下列几点重要意见。

一、文中明显说出，所以出为彭泽令，是自己要求的，为得官俸以解决生计；而在官八十余日就弃官而去，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性情不适合于做官，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不能勉强；虽然考虑到生计问题，但是违反本性还是很痛苦的，所谓“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因此想到，自己以前数次出仕，都是为了糊口，总结以前的经验教训，“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这句话很重要，它不仅是指出任彭泽令，而是说以往数次出仕都是违背本心的。在这一总结之后，决心弃官归隐，不再出仕。所谓“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颜延之《陶征士诔》）他因家贫而出仕，因不谐俗而去官，都明白说出，光明磊落。苏轼说：“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李公焕《补注陶渊明集》总论）这些论断是切中的。

二、陶渊明所以弃彭泽令，其思想根源上文已说明，至于序文中说：“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则是一种藉口。史传所言不肯折腰督邮，亦是一种藉口。陶澍《靖节集注》说：“先生之归，史言不肯折腰督邮，序言因妹丧自免。窃意先生有托而去，初假督邮为名，至属文，又迂其说于妹丧以自晦耳。”这个分析是合乎情理的。陶澍又说：“其实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故曰‘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又曰‘帝乡不可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这个深一层的推断，也颇有道理。因为在义熙初年，刘裕权势甚盛，晋室灭亡已成定局，陶渊明既无回天之力，只好归隐田园，不闻理乱，保持清节。义熙九年（公元412年），征著作郎，不就。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征著作佐郎，

不就。一直终老田园。

三、陶渊明出为彭泽令的经过，也可就序文略加阐释。序文所谓：“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以为“四方之事”指刘裕等起兵勤王，“诸侯”指刘裕等。非是。按义熙元年陶渊明为江州刺史刘敬宣建威参军。三月，陶曾奉命赴建康，陶集中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所谓“有四方之事”者，殆指此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即注云：“衔建威命使都。”所谓“诸侯以惠爱为德”之“诸侯”，应是指刘敬宣。刘敬宣是陶之府主，他又是江州刺史，有任命所属县令之权，陶之出任彭泽令，刘敬宣盖与有力焉，所以说“诸侯以惠爱为德”。至于“家叔以余贫苦”句中之家叔，指陶夔（陶渊明为其外祖孟嘉所作《孟府君传》中有“渊明从父太常夔”之语），陶渊明之为彭泽令，陶夔也帮了忙。

陶渊明于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十一月弃官归里，次年，即义熙二年（公元406年）春间，作《归去来辞》及《归园田居》诗五首，这年陶渊明四十二岁。

《归去来辞》这篇文章仅三百四十多字，但是写出陶渊明前半生数次出仕而后半生田园归隐的转折关键，是研究陶渊明为人及其思想意识的重要文献。根据高步瀛的意见，此文可分为四段（据《魏晋文举要》）：

自篇首“归去来兮”至“恨晨光之熹微”为第一段，内容是“悔悟思归”。

自“乃瞻衡宇”至“抚孤松而盘桓”为第二段，内容是写“初归”。

自“归去来兮”至“感吾生之行休”为第三段，内容是说“谢绝交游，流连林壑”。

自“已矣乎”至篇末为第四段，内容是说“委心任命”。

在第一段中，“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

觉今是而昨非。”点明悔悟思归之意。陶渊明《归田园居》诗第一首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按：原作“一去三十年”。兹依吴仁杰、刘履说校改。）他性爱山林，不能谐俗，自二十九岁出仕至四十一岁弃官归里，首尾十三年。在这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始终存在着仕与隐的矛盾。到义熙元年弃彭泽令，才断然觉悟，迷途未远，今是昨非，从此再不出仕。这是他一生在仕隐问题上的一个转折关键。

第二段写初归后家居乐趣。也就是《归园田居》诗所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之乐。至于“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二句，可能是义兼比兴，如陶澍所谓“闵晋祚之将终”之慨。

第三段写息交绝游之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在古代，士大夫都是以禄代耕，不亲耕稼。陶渊明以前虽然也曾“躬耕自资”，但都是暂时的，而这次弃官归田，将长期耕植自给，这对于陶来说，还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陶的情绪是乐观的。他说：“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复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字里行间，充满乐观情趣。他看到在春天大化运行中，木荣泉流，万物得时，而人生老去，于是表现出哀叹与旷达兼融的老庄哲学思想。

第四段写委心任远的情怀。富贵既非所愿，神仙复不可求。安心于农耕生活，在植杖耘耔之余，可以登皋舒啸，临流赋诗，归结为“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即是庄子所谓“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陶渊明不但有真淳、清高、旷达的襟怀，而且有很高的文学天才，所以这篇《归去来辞》在艺术风格上也是上品。朱熹论《归去来辞》曰：“其词义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转引自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这是说，陶的《归去来辞》从体裁上说虽出于楚骚，然而在艺术风格上则是“夷旷萧

散”，与楚骚之幽忧怨悱者不同。

陶渊明的为人与作品都是真淳的，但是他所处的晋宋易代之际却是一个诈伪的时代，陶渊明是不合时宜的，所以他作了一篇《感士不遇赋》。在这篇赋的序文中，他慨叹说：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间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

但是精金美玉，自有真价。南朝人中，除去颜延之作《陶征士诔》称赞陶的人品之外，其后就是梁昭明太子萧统。萧统很喜爱陶的作品，他编定《陶渊明集》，并作序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并加以赞扬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为此乎？”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但是在南朝的文学风气中，一般人很少有萧统这样的独具慧眼。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作《文心雕龙》，历评宋齐以前文人，独不及陶渊明；钟嵘作《诗品》，列陶于中品。到了唐代，陶渊明作品的价值逐渐得到承认。大诗人杜甫常称道陶渊明，而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也受到陶诗的影响。到了宋代，陶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大诗人苏轼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总论”）对陶诗作出极高的评价。苏轼晚年贬逐海南，以陶渊明集自随而遍和其诗，可见其爱嗜之笃。此后，陶渊明遂与屈原、杜甫等同跻于中国伟大诗人之列。

六朝门阀士族的历史地位

孟 昭 庚

门阀士族，一向被认为是腐朽的社会阶层，它只有被诅咒的份，却无可称道的地方。但马克思一个基本原理是：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衰落和死亡的过程。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否则它就不会出现和生存。门阀士族在我国至少延续了三百年，如果它自始至终都是腐朽衰败的东西，那就使人难以理解了。因此，我们应该如同对待其他事物一样，认真加以研究，以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评价。本文不是一个研究成果，而是一般的评述。

一

六朝时代是江南经济空前发展的时期，这是公认的事实。而江南经济开发的主要原因在于北方劳动人口的南迁、先进技术的传播。但是在封建时代，生产的主要担当者是个体农民，而个体农民的力量是十分单薄和脆弱的。在时局相对平稳时，农民单独迁徙尚属可能，在大乱年代，农民单独行动就困难重重了。唐末五代时期、北方人口南迁多由农民军统领，如湖南之马殷，福建之王潮，黄巢北撤留居南方者为数也当不少。东晋南北朝时代却大不相同。西晋灭亡后，北方陷入空前持久而惨酷的动乱中，落后民族在中原展开频繁猛烈的战斗，个体农民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杀戮和捕捉的对象，他们失去单独存在的依据，大批农民除被少数民族统治者强迫迁徙、杀戮、俘掠为奴者外，多数不得不向豪

门士族之壁坞靠拢，当壁坞组织在北方难以存身时，士族便携带壁坞组织的群众集体南下，“坞主”也就一变而为“行主”。到江南落脚以后，士族以其声望地位、取得封建政权的承认，划一片闲散土地从事耕作，以其原籍命名，设置侨郡县，其陆续南下之原籍人员也渐次向此侨郡县集中，因此，这些豪门士族在并非自觉的情况下，成为南徙人口的组织者，如王导、徐澄之、郗鉴、祖逖等人都是其代表人物。

江南原来的富庶地区如太湖流域多为江南豪族所盘据，北来士族中继续向这些地方发展，势必加剧南北士族的矛盾斗争，而且南下人口多种旱田，水田耕作一时还未能适应，因此，南来人口多向江南的岗阜地区发展，我们从南迁民户多集中在今南京、镇江、常州、丹阳一线，且此线侨置州郡最为集中这一事实便可觉察这一消息来。这一带是平岗黄土层，适合耕种旱田和桑麻。这样，不但南方荒废的岗阜地带得到开发，且使旱田作物和先进的丝织技术得到广泛传播。

南来的品位较低的士族在江、浙一带无法与江南土著豪族和大士族竞争，便直向南方穿插，如林、黄、陈、郑诸家族在福建长期定居下来，大大扩大了开发的领域，这种长途跋涉，决非个体农民所能胜任。

江南地区除部分岗阜地区可资旱田耕作外，更广泛的是山林湖泊，南迁人口进入山区进行个体耕作并非绝无，但大规模的开发却非个体农民所能为力，而是士族豪门通过他们控制下的各种劳动人口进行的。谢灵运有一篇《山居赋》描写他的庄园情况。在他的庄园中有住宅，山道、竹林、农田、渠道、果园、菜园、蚕桑麻苧、烧炭、制陶、搓绳、酿酒、造纸等，几乎无所不有，谢灵运又曾要求将会稽回踵湖泄水为田，又要将始宁嵒岵湖改为良田。《颜氏家训·治家篇》也谈到地主庄园中除食盐之外，一切生活用品无须外求。六朝时代，江南地区遍布着大大小小士族豪门的田园别墅，今苏南以“墅”命名的地名，当与士族豪门的田园

别墅有关。显然，庄园式的经营要比个体农民开发有效得多。

无须讳言，士族开发经济是靠压榨剥削劳动者实现的。但六朝时代，农民要逃脱剥削是难以成为事实的，封建政权的徭役，赋税剥削甚至超过士族对佃客的压榨。当农民不能作为自耕农民独立存在时，他们宁愿投入士族的荫庇之下，以换取一个勉强从事再生产的环境，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依附农民比个体农民更具有生产性，这就是荫户不断增长，检籍和土断往往不能凑效的根本原因。

“魏晋封建论”近年来又一次提出，姑且不论两汉时代是何种社会，但魏晋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却都是停留在或正向奴隶制过渡的社会，他们进入中原后，大都以抢掠人口为目的，北魏初期，每次战斗，还是以“班赐生口各有差”的办法来鼓励士气，直到西魏时代，还把江陵数以十万计的人口没为奴婢。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士族筑坞自保，集中大批劳动人口，阻止奴隶制的无限制发展。南迁以后，由于封建政权的超负荷赋役，大批农民又被迫投入士族的门庭，成为士族的依附农民，构成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

江南豪族各有为数不等的奴婢。但在六朝时代，奴婢这一阶层比较复杂。其中一部分有他们自己的经济，他们本质上是农奴，而非“奴比畜产”的奴隶。有时甚至奴中有奴，婢中有婢，他们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在汉代“江淮之有虎狼，犹北土之有豚犬也”，经济远远没有开发。东南地区“既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阶级分化尚不明显，六朝时代，在南方，士族豪门和佃客、部曲的封建关系广泛建立起来，这是一种进步现象。

二

西晋亡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相继进入中原，在中原进行长达二百余年的猛烈而惨酷战争，他们不时要进军江淮。南